

为何担忧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

科林·S·格雷

2012年2月

本文探讨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动态，尤其关注中美关系中的危险因素。毫无疑问，我们不应忽视或低估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动态，但也有理由对此表示严重担忧，以免把竞争作为主导性叙述压过合作。在我们人类的战略史中，令人震惊的记录——指在历史进程中使用武力威胁所产生的影响——应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可怕事件和情节时有发生，而且还会继续时而发生，在反复发生的一般理由中，它们已不再是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的。¹

认为在“当今时代”，换句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本文中指21世纪，但这种主张之前已经提过），情况将大不相同，这是司空见惯和毋庸置疑的事情。道德、政治、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当然还有变化，据称是为了确保未来不会重复过去。在详细预期层面上，这种说法绝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在人类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国家与政府关系提升层面上，这种主张则是缺少说服力的。尽管不一定无趣，但本讨论还是会尽力避免提

出一些无法回答以及对我们毫无帮助的问题，如“在揭示历史战略维度相对重要性中累积的重要缓慢倒退时，21 世纪会截然不同吗？”史蒂芬·平克教授曾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辩论论文，内容是关于有组织暴力活动呈下降趋势，这篇论文非常有意思，而且还有一定的价值。²但是，他最近发表的观点却不足以消除使我在此进行探讨的担忧。

之所以对战争前景、对缺乏活跃敌对行动的竞争前景，或对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前景表示严重担忧，其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位人士值得引述的话进行简洁而明确的表述，他们依次是修昔底德

（Thucydides）（雅典的一位将军和历史学家，公元前 400 多年）、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美籍荷兰裔政治学家，1942 年）和阎学通（Yan Xuetong）（中国教授，2011 年）。以下是其相关话语：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在三个最强有力的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的驱使下，确实接受一个奉送给我们的帝国，并且不肯放弃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所作所为则不足为怪，这与人类的普遍惯例也没有相悖之处。并不是我们首创了这个先例，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一直就是一条普遍的法则。

修昔底德（大约公元前 400 年）³

时间向后跨越近 2500 年：

没有机械动力——移动物体的能力——技术就不可能产生。没有政治权力——调遣人员的能力——技术就不能为社会服务。因此，所有文明生活都要依靠后面的一种力量。

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1942年）⁴

此外：

如在其他社会团体中一样，在国际社会中，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基本方法，即合作、调解和抗议。

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1942年）⁵

此外，引用一位中国作者在 21 世纪对古老智慧的重新陈述：

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断扩大、军备能力的不断增强，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这将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和科技上同美国竞争。这种竞争可能造成外交关系紧张，但不太可能造成军事冲突。

阎学通（2011年11月21日）⁶

这位博学的中国教授对解除军事威胁拥有相当大的信心也许是正确的，当然人们希望他如此，但是如果想当然地认为他的乐观值得信任，这却是不谨慎的做法。如果历史对事件的叙述相对友善和庄重，许多不应发生的事情就会莫名其妙地发生。当我们努力思考即将到来的世纪时，如果没有必要惊慌，我们至少应该从人类 2500 年的经验中得到告诫，我们有

多种但仍然可以说是足够的渠道获得这些经验。我们不必而且不应该盲目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不应对值得注意且通常是非常严酷的历史起源置之不理或漠不关心。前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话经常被引用，他曾经试图弄清楚极为重要的关于我们知识局限的课题。拉姆斯菲尔德在经常被引用且几乎经常被误解的话中声称：

就我们所知，有些东西是已知的已知，那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了。我们还知道存在已知的未知，即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也存在未知的未知——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⁷

试图改进拉姆斯菲尔德对知识分类有几分百科全书式的尝试，看起来似乎有些迂腐，但他的类型学方法论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如果在他确定的三个知识类别上，再增加另外一个类别，他的方法论可以得到相当大的改进。具体来说，存在“已知的已知”其实是错误的，它们的分类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事实尤其危险，因为它们会构成被认为是事实的假设。我们知道，对于未来的历史进程没有完整可靠的事实，在不得已求其次的情况下，我们要根据对过去和现在知识的学习做出推测，我们有责任在此推测基础上做出假设。虽然我们确实会不可避免地对未来细节有无知的方面，但我们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宝库，可以解释过去发生的事件如何和为何发生。我们称历史为过去，历史学家愿意对此做出诠释和说明。过去

的事情总是需要诠释，否则过去就仅仅是对事件毫无意义的记载。引用 F·A·海克（F. A. Hayek）的话说：“没有理论的事实是不能说话的。”⁸上文引用的三位作者的话，都是以大量的实证记录为基础，对历史做出的诠释。这些诠释仅仅是理论，但是作为对历史进程的阐述，它们又构成了得到经验证明的理论。修昔底德、斯皮克曼和阎学通综合了跨越千年的文化认为：国家在政治上受到恐惧、荣誉和利益的驱使；政治就是权力；以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和即将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之间，政治（*其中包括*）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对所谓的“历史教训”保持谨慎态度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怀疑态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些“教训”可能很好地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值得商榷但又前卫的理念，而不是揭示客观真理。然而，在审慎的怀疑态度和其具体权力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以高傲态度对待严谨的学者对过去做出的结论，将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未来经验和我们可从中解释过去的各种可用证据之间的对比，绝不会更加强烈。鉴于过去是经验、肯定证据、否定证据以及肯定否定证据结合领域，因此未来仅仅是希望和意图的领域。

历史记录及其强大且明显永久的（军事）战略层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修昔底德、斯皮克曼和阎学通在对持久的人类政治状态进行毋庸置疑的相当严格的评估方面是正确的。为了预测中国和美国是否肯定沿着掺杂着竞

争、反抗、对抗和战略危险原因和时机的道路前行，人们不需要拥有一个完全可靠的可预言未来的水晶球，或者成为坚定的悲观主义论者。人们可以不带偏见地对两国政策中实际或预期的真正优点撰写观点。了解修昔底德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式，就是要理解在合作行为占主导条件下，为何不能审慎地假设控制中美两国未来关系的一般良性条件。

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曾写道：“谨慎是政治家的最高美德。”⁹在当代假设、政策、战略和行为背景下，谨慎态度有史以来成为应该值得争论的一个主题，但本文必须记录这样一个观点，即危险的竞争有可能，尽管不是肯定，压倒两国之间的合作利益，这种合作如果不总是主观上，在客观上当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所谓的“历史教训”总是有疑问的，但过去可以解释为危险警告标志：引以为戒的故事正等着要告诉人们。¹⁰中美两国为何应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和平共处，确实有非常强大的理由。事实上，我们很容易说服自己相信，理性和理智几乎支配着中美关系，即使这种关系在某些细节方面，不可避免地因某件事情陷入麻烦，它本身一定适用于共同管理。这种客观预测所带来的麻烦，依赖于对国际政治中理性和理智的谨慎假设。

理性战略思想和行为逻辑可能是永恒、普遍的，但其具体内容始终处在被驱动或至少受恐惧感、荣誉考虑和利益评估影响的风险之中，在判断

国外决策者时，这种逻辑的表现是不合理的。我们还没有托管两个卓越国家之间主要冲突关系的法律，但历史记载显示，谨慎的治国方略总是涉及抵制国家权力的增长，国家权力似乎拥有明显减少人类自由判断政策和战略的能力。我们有必要铭记，安全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威胁概念包括能力和评估（可能猜测的，没有完全揭露的）意图的融合。在实践中，人们无法真正推算出（国家）安全需求，原因是，安全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种可证实、可计算的条件，因而这是一种超出决定性的、实质补救的判断力。一旦某个国家察觉到其他政体对其怀有恶意意图，而且该政体被认为是竞争对手，几乎没有谨慎的、防守性的军事准备措施，可以提供其政治主人，使其对足够的安全拥有预期的信心。和财富一样，相信人们会享有很多的安全感或许是不可能的。

我们所了解的整个人类历史，记录了两个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相当（通常是不对称的）能力和抱负或主张的领先国家之间的竞争、对抗、敌意和频繁战争。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来说，以可承受的净成本（有时从更长期的角度看，甚至以无法承受的成本），对其外部环境争取尽可能多的控制权，这完全是正常的。当国际政治体系包含这样的两个国家时，在其各自情况中，保持谨慎态度的逻辑，支配着相互竞争和经常性敌意的范畴。其结果经常是出乎意料的悲剧，但这种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治国之道进行显然明智的、审慎的推理的结果。当政治家们必须询问其决策进

程和宏伟战略的制定时，“谁或者什么可以给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用两个即将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来回答是不言自明的。对无所不知的观察者来说，它们有充分的理由无需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观察者能够看到两个政体之间真正共同利益的深度、幅度和背景。¹¹但是，在被认可的修昔底德政治体系中，对政治家及其民众来说，竞争的逻辑和谨慎态度，往往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它是相互的，从而也是互惠的。当今，中美两国的政治家们在寻求竞争优势的努力中，对危险的竞争或危险的冒险活动，确实怀有很少的愿望。但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于1852年在睿智的忠告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逝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¹²

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历史进程在实质上，必须是呈线性的和连续的，这也是为何编年表对历史认识如此重要的原因。但是，即使一个事件直接来自于以前发生的、各种因素的、必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呈线性的故事，也可能与期望完全相反。随意引用历史非线性，往往会混淆变革、意外和真正的矛盾，这在字面上意味着自相矛盾。这些思想与本文论点的相关性，是其作为提醒上文所引用的、马克思论点的力量的价值。对一些读者来说，“一切已逝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也许就如过于悲

观的一片阴影，但他的中心点，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确实是警戒性的金玉良言。中美关系上演的舞台，甚至中美关系发展所利用的许多谋略，对当今活着的参与者们来说，实质上都是“已知的”。在制定方针过程中，谋略变化和改变可以进行尝试，而且可以取得一些成功，但当代政治领导人在其实施治国之道和战略过程中，不能随意否认上面引述的修昔底德、斯皮克曼、阎学通和马克思思想中的持久的价值。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有许多实际和潜在的担忧理由，尤其对两国在战略历史中，可能带来的后果表示担忧。我选择非常简单的、仅对造成两国关系麻烦的三大来源，发表评论。这三大来源完全超出人类（政治）的可控制范围，但仍然是有效的，用马克思的比喻来说，它们在历史舞台上竞争因素。具体来说，担忧的原因包括：摩擦、机会和偶然性所发挥的作用；基本的政治联合，意味着国内和国外政策的政治性，必然是紧密相连的；最后是在对亚太地区力量平衡中的结构性转变，以及这种结构性转变，对地区、甚至对世界秩序的含义，进行预期和预测时的错误概率。诚然，这些都是具有庞大领域和绝对复杂性的课题，但是，没有人最近声称，治国之道对懦弱者和不懂世故者来说是一种专业。

首先，再次引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简洁而雄辩的话，“意外之事发生了”（stuff happens）（2003年8月11日所说的话，指在被解放/

被征服、被占领，但无人巡查的巴格达地区的混乱局面）。“摩擦”

（Friction）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使用的综合性概念，用以涵盖为何事情在晚上就会出错的所有原因，以及为何甚至真正狡猾的计划，还需要适应意想不到的情况的所有原因。¹³计划和行动执行总是不同的，通常是由于没有预料到的原因，更不用说具体的预测了。中美两国互动越多，容易发生意外摩擦事件的次数就会越多，其中包括（可能是相互的）预期行为没有发生时的非意外事件。摩擦、机会和偶然性是所有人人类关系（不排除政治关系）的特征，但当它们在早已设置了竞争和更糟糕事情，以及合作的舞台上出现时，它们就会有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

其次，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对“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句格言内涵会带来扩大影响的结果。至少在当今时代，如果要想保持外交政策在国外是可持续的，那么它必须在国内也能发挥足够好的作用。在其战争理论中，克劳塞维茨并非无缘无故地把人们的激情作为关键因素。¹⁴中美两国的政治领袖可能是冷静和理性的，但他们不能漠视有时其国内民众的政治影响力所引起的沙文主义（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在当代背景下，中国的活力包括努力实现改革，遏制和惩治腐败，以及应对人口及其他大规模的近系统社会问题。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外部政策和战略必须大大受制于国内考虑事项的逻辑，其中有许多是不受欢迎和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其

他地方，国家机关通过立法可以促进必要的国内和谐，而国家机关可以定期通过“拥护”中国而得到提高。我们可以挖掘以国家牺牲主题占主导的现代历史叙述，来纠正当前可怕的合法性赤字。对于美国来说，尽管在总统选举年普遍地大声疾呼拒绝行动方针，但由于国内经济衰退问题，国内政治景象深受困扰，这种困境有可能推动外交政策决策者和解释者，冒着阻力向无理好斗迈进。许多美国人很难让他们围绕着转变的想法而去思考，更不用说现实了，这种转变是一种全球性的，当然也是地区性的权力转变，从看似不可挑战的单极状态，甚至更不可挑战的单极状态，向其他方向转变。这种转变是一个相对的过程，但在不可否认的国内金融管理遭遇失败的情况下，尽管与毫无说服力的主张相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拥有过度野心的这个简单证据组合起来，有助于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一个不稳定的国内背景。

第三，正如总结的那样，我们有重要理由担心中美两国是否有能力继续谨慎处理两国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关系，这种关系对支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为何两国还可以对双方关系中的冲突持包容态度的原因，在理性和本质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指责阎学通教授自满是不公正的，当然，我不会这样做。不过，他认为“不太可能造成军事冲突”的主张，必须贴上相当大胆猜测的标签。这不是而且不能是一种推测，因为没有可以检验这种主张的方法。在似乎有道

理的争论之外，事实看起来好像是处在自我提升期（包括同等重要的长期军事现代化）的、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创造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愿意承担的、长期存在的世界秩序，必然带来强有力的挑战。在权力赌注中，大国通常不会通过友好、合作的权力转移（降级）获得极权位置。继续保持排名第一或至少第一（接近）平等的努力，原则上，至少必须为开始本讨论而引用的看法中、所确定的风险，增加推动力。

¹科林·S·格雷，《战争、和平与国际关系：战略史入门》第二版（艾宾顿：路特雷奇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3页。

²史蒂芬·平克，《心中的美丽天使：暴力在历史上的衰落及其成因》（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2011年出版）。

³修昔底德，《修昔底德的里程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著：罗伯特·B·斯特塞勒，修订：理查德·克雷雷（纽约：自由出版社，1996年出版）。

⁴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42年出版），第11页。

⁵同上，第15页。

⁶阎学通，“中国如何才能打败美国”，刊载于《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1月21日号，第12页。

⁷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已知与未知：回忆录》（纽约：Sentinel出版社，2011年出版），xiii页。

⁸F·A·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的奥地利籍经济学家，1899-1992），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伦敦：哈金森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6页引用。

⁹雷蒙德·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585页。

¹⁰参见迈克尔·霍华德编著的《历史的教训》（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一章。

¹¹参见迈克尔·霍华德编著的《战争起因与评论》（伦敦：Counterpoint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15-217页。

¹²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收录于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奇·恩格斯《两卷选集》第一卷（1852：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247页。

¹³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由迈克尔·霍华德和彼得·帕雷特翻译（1832-1834，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第119-121页。

¹⁴同上，第89页。

科林·格雷 (Colin Gray) 博士是英国雷丁大学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教授，他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担任过美国和英国政府顾问，著书 25 部。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战略之桥：实践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战争、和平与国际关系：战略史入门》第二版（路特雷奇出版社，2012 年出版）和《战略效应的制空权》（赫斯特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